

应用翻译伦理研究的认知路径

周 猛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当前, 学界针对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实践路径的探讨尚不充分。本文以翻译伦理实践的情境认知内核为理论基石, 提出并扼要阐释应用翻译伦理研究的三条认知路径: 1) 聚焦译者翻译伦理决策思维过程的“翻译伦理决策过程研究”, 2) 关注译者翻译伦理行动社会过程的“翻译伦理行动过程研究”, 3) 揭示译者个体、翻译环境相关主客观因素对译者翻译伦理决策与行动影响的“翻译伦理实践影响因素研究”。本文提出, 翻译伦理的认知研究可被视为认知翻译学的一个专门关注译者伦理认知的新兴分支, 其稳步开展可同时推动翻译伦理学与认知翻译学的进步。此外, 相关研究的成果能为翻译伦理实践与教育提供重要启示。

关键词: 翻译伦理; 翻译认知; 应用翻译伦理研究; 情境认知

Cognitive Pathways of Applied Translation Ethics Research

ZHOU M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ethics studies in China, more applied translation ethics research is needed. However, presently, scholarly discussions on the possible pathways of such research are far from adequate. Starting from the fact that translators' translation-ethical practices are a form of situated cogni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ree complementary cognitive pathways of applied translation ethics research: research exploring the mental processes of the translator's moral judgements, research describing the social processes of the translator's moral action implementation, and research to reveal how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hape the translator's moral judgements and consequent actions. It is highlighted that cognitive applied translation ethics research can be viewed as an emerging branch of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CTS). Also, the accumulative results of such research promise to significantly inform the practice and training of translation ethics.

Key words: translation ethics;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pplied translation ethics research; situated cognition

1. 引言

翻译伦理进入翻译研究视域在西方已有四十年历史, 在我国亦有二十余年历史。时至今日, 翻译伦理学已成为中西方翻译研究中一个极具活力的门类。历经二十余载发展,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实现了从介评西方经典翻译伦理理论(如刘云虹 2014; 辛广勤 2018)到自主构建特色翻译伦理理论(如申连云 2020; 李征 2023)的重要跨越(杨荣广 2021; 辛广勤 2024), 同时在厘清翻译伦理研究范畴(如杨洁、曾利沙 2010; 彭萍 2013; 吴术驰 2021)、探讨翻译技术相关伦理(如蓝红军 2019; 张宵军、

邵璐 2021; 张政、王赞 2024)等方面做出了扎实探索。

尽管如此,国内现有翻译伦理研究绝大多数为抽象的理论探讨,鲜有研究使用实证方法描述现实翻译活动蕴含的复杂伦理动态。依照吴术驰(2021)的提法,理论性的翻译伦理研究属“纯翻译伦理研究”,其使用先在的伦理思想或观点来论证翻译的价值本质,意图对翻译伦理实践予以预测;描述性的翻译伦理研究则属“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其关注翻译伦理实践,旨在基于实践产生的经验与思考提出一套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显然,国内翻译伦理研究当前存在重“纯翻译伦理研究”、轻“应用翻译伦理研究”的倾向,长此以往,不利于领域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从社会需求来看,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理论话语的简单化倾向与实际翻译场景的复杂化与多元化呈现出巨大的鸿沟”(杨荣广 2021: 82),无法为变化中的本土翻译实践提供有效伦理规约。要解决前述学术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问题,本土“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应与“纯翻译伦理研究”齐头并进。李瑞林(2020)指出,具有应用译学属性的翻译伦理研究须以揭示翻译生活的实践理性为任务,进而建立“理论上自洽、实践上可行”的翻译道德规范。毋庸置疑,加紧开展实证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已成为国内翻译伦理研究实现更大、更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应如何行之有效地开展呢?

吴术驰(2021)在论述应用翻译伦理研究的开展路径时指出,研究者应对翻译伦理实践开展反思性总结并最终提出处于伦理高度的理论或规则。事实上,吴的提法仅为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多种路径中的一种。本文提出,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可着眼于译者翻译伦理实践的情境认知本质,使用多元实证方法考察译者在场化的翻译伦理决策(即伦理判断)与行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调控或规约译者伦理实践的可行方法。下文将以此观点为基础简要剖析应用翻译伦理研究的几种认知路径。

2. 翻译伦理实践的情境认知内核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实践具有复杂的伦理维护。冯曼(2020)指出,伦理旨在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种关系,并力图对这些关系进行秩序规约。作为伦理的一个应用分支,翻译伦理意在规范译者的翻译相关行为,亦具有人际、人一社会、人一自然三个价值界面。此外,Baker(2018)提出,由于译者的每项决定都有可能对他者造成影响,其所有决策都具有潜在伦理性。因此,翻译伦理关涉译者纷繁的与翻译相关的伦理决策与行动。翻译伦理实践的界面与内容复杂性给以之为描述对象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提出了现实挑战。所幸,我们可着眼于其情境认知本质,透过无序、动荡的表象把握其稳定的内核。

情境认知指人的认知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物理环境中并无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叶浩生 2010)。情境(与涉身)认知代表了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根本观点,是对计算主义认知观与联结主义认知观的重要修正(李其维 2008)。Flach(2008)指出,传统的聚焦于人脑信息处理过程的认知论属“微观认知”论,而情境认知论关注人与环境的紧密互动,属“宏观认知”论。Flach强调“一切认知皆是宏观认知”,即一切认知活动必然发生在特定情境中。在认知翻译学领域(文旭、肖开容 2019; 谭业升 2021),学者们对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微观认知”到“宏观认知”的积极转变(Muñoz Martin & de León 2020)——研究者日益强调翻译实践的情境认知本质,并着力从译者与环境互动的视角研究翻译认知,催生了日益增长的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如 Risku & Windhager 2013; Risku et al. 2017; Sannholm & Risku 2024)。

翻译伦理实践的情境认知性已成为当代翻译伦理研究者与教育者的共识。在翻译伦理研究领域,新世纪开局以来,研究者们(如 Koskinen 2000; Inghilleri 2012; Pym 2012; Tymoczko 2014)愈发认识到译者的伦理实践是情境化的,扎根于特定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现实。例如,Inghilleri(2012)指出,译者的翻译伦理决策无法超脱其置身的社会语境与当下情境,因而无可避免地受各类情境因素影响;同时,译者的伦理决策也是主观和非中立的,受其价值观念的影响。沿此逻辑,译者的翻译伦

理实践是译者个体与其所处环境互动的产物,即一种情境认知活动。鉴于译者伦理决策的情境性,在翻译伦理教育领域,翻译伦理教学研究者与实践者均提倡或业已使用伦理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情境建构性教学法,培养学生针对典型翻译伦理情境的伦理感知与判断能力(Baker & Maier 2011; Floros 2021; Zhou 2022; Lambert 2023; Tipton 2024)。

从认知视角审视,翻译伦理实践是译者在翻译伦理情境中做出并执行特定伦理决策的社会认知过程,这一过程受译者个体与翻译环境的双重制约。我们可以用图1的简化模型展示该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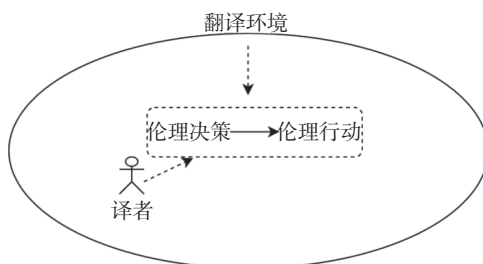


图1 翻译伦理实践的情境认知模型^①

以图1所示模型为基础,我们可将译者的翻译伦理实践划分为三个关联过程:一是译者根据翻译伦理情境特点进行在场化的伦理判断,二是译者根据所做判断将其选择的伦理行动付诸实践,三是译者的个人因素与翻译环境因素参与调节译者的伦理判断与行动过程。据此,我们可提出针对译者翻译伦理实践的四个实证描述对象:

(1)译者翻译伦理决策:指译者在大脑中通过伦理情境感知与分析等步骤做出伦理判断的思维过程,是翻译伦理实践的内在机制。

(2)译者翻译伦理行动:指译者在做出伦理决策后将相关决定付诸实践的社会过程,是翻译伦理实践的外化形式。

(3)译者个体因素对其翻译伦理实践的影响:指译者个体的主观(如道德动机、认知风格)与客观因素(如年龄、性别、翻译经验)对其翻译伦理判断与行动施加的影响。

(4)翻译环境因素对译者翻译伦理实践的影响:指翻译环境中的主观(如文化、翻译价值规范)与客观因素(如翻译合作流程、翻译技术工具)对译者翻译伦理判断与行动施加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提的实证描述对象仅基于本文对翻译伦理实践情境认知的简单模型化,无法穷尽认知视野下翻译伦理实践的描写维度。此外,这些对象的划分是主观人为的,旨在方便本文的论证,相关过程间实际上并无明显、稳定的边界。

3. 翻译伦理研究的认知路径剖析

在道德认知视域下,以翻译伦理实践为描述对象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以译者的翻译伦理决策及行动为焦点,针对第2节所提的四个描述对象开展。其中,关注对象1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属“翻译伦理决策过程研究”,关注对象2的属“翻译伦理行动过程研究”,关注对象3和4的属“翻译伦理实践影响因素研究”。下面,我们逐一对这些路径进行扼要阐释。

“翻译伦理决策过程研究”聚焦于译者情境化的翻译伦理决策过程。Elm(2019)指出,针对人类道德决策的研究出现了从“规定范式”到“描述范式”的转变:前者使用特定的道德决策理论模型自上而下地分析主体伦理决策的微观过程与特点,后者采用行为伦理或者实验哲学路径,不带预设

^① 图中实线箭头表示因果关系,虚线箭头表示施加影响。

的描述真实场景中的伦理决策过程,并据此总结规律或提出假设。在现有翻译伦理研究中,就理论驱动的“规定路径”而言,已有学者(如 Abdallah 2011; Dean 2015)采用来自认知心理学的道德判断理论或基于理论的道德测评工具研究翻译学习者或职业译者的伦理决策过程及特点。例如,Dean(2015)使用由 Rest 等(1999)基于道德发展阶段理论(Kohlberg 1971)开发的“定义问题测验(Defining Issues Test)”对美国职业手语译员的翻译伦理决策特点进行了初步探索。“定义问题测验”中,受试先阅读虚拟的道德两难情境,而后对一系列与情境相关的陈述进行重要性打分和排序。通过对受试答案的量化分析,研究者可对其道德推理能力进行评估。Dean(2015)发现美国职业手语译员的道德判断水平主要处于“维持规范阶段(Maintaining Norms Stage)”,即倾向于在道德决策中遵循社会规范。就数据驱动的“描述路径”而言,随着翻译伦理研究域内实证之风的兴起(周猛 2022),已有研究(如 Inghillieri 2012; Howes 2023)基于对译者在场化伦理判断过程的描述总结其特点。例如,Howes(2023)通过对澳大利亚社区口译员面对翻译伦理难题时的决策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其伦理判断大多贴合《澳大利亚翻译职业道德规范》所包含的伦理准则。截至目前,专门针对译者伦理决策过程(包括基于虚拟情境和扎根真实翻译场景)的认知研究远未形成气候。当前,以 Deepseek 和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极大加剧了翻译中诸如隐私泄露、偏见、歧视等伦理风险,使译者在场化的主体伦理决策愈加复杂且更为关键。因此,加紧开展本文所提的“翻译伦理决策过程研究”尤为必要。相关研究若践行“规定路径”,可尝试对道德心理学内的各类道德决策模型(包括理性模型、直觉模型、双系统模型^②)进行迁移应用;若采取“描述路径”,则应采取严谨方法对译者的情境化伦理判断过程进行深描并对其规律进行谨慎归纳。

“翻译伦理行动过程研究”聚焦于译者由伦理判断引发的外化伦理行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关注译者实际的翻译伦理行为,如翻译策略、与其他翻译活动主体的互动等,旨在揭示译者情境化的翻译伦理问题处理方法。此类研究有两重目的:其一,理解译者翻译伦理行动的社会认知过程。相关研究可从日益增长的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如 Risku 2014; Risku et al. 2017)汲取灵感,着力于描述译者在真实翻译场景中的伦理行动过程,揭示该过程与翻译社会—技术系统的紧密互动。例如,研究者可借鉴认知翻译学者采取的“工作场所研究(workplace studies)”路径(Risku et al. 2017),深入真实翻译工作场所进行田野调查,探究译者在特定社会、物理空间中的翻译伦理行为。其二,呼应吴术驰(2021)的观点,此类研究亦力图基于对译者翻译伦理行动的描述提出具有“实践理性”(李瑞林 2020)的翻译伦理准则或规范。若相关研究旨在提出翻译伦理规范,本文建议研究者寻求与伦理学者的跨学科合作,以令人信服地完成事实描述向价值规定的跃进^③。在基于实证数据提出翻译伦理规范时,研究者应注意翻译伦理的社会、历史、文化及情境特殊性,避免夸大相关发现的适用范畴。无论研究者开展“翻译伦理行动过程研究”的目的为何,就实证数据的获取方法而言,由于伦理行动是情境化的,参与式观察(常内含于民族志路径)、实践中的反思日记等高生态效度研究方法原则上优于针对译者过往道德经历的问卷与访谈等低生态效度方法。

“翻译伦理实践影响因素研究”聚焦与译者个体、翻译环境相关的主客观因素对译者翻译伦理决策与行动过程的影响。由于翻译伦理实践是情境化的,必然发生于特定的“认知生态”(cognitive ecology)中,因此受到“思维—身体—环境”连续体的影响(Hutchins 2010)。此类研究聚焦于译者内

^② 根据认知心理学内针对道德决策的研究成果(MacDougall et al. 2014; Elm 2019),人的道德判断分为直觉式(如 Haidt 2001; Sonenshein 2007)和推理式(如 Trevino 1986; Jones 1991)两种:前者是迅速的、潜意识的、情感推动的,后者是分析式的、有意识的、有情感参与的。当前,“直觉—推理双系统”道德决策模型(如 Reynolds 2006; Greene 2014)已成为最为广泛认可的道徳决策理论。

^③ 关于事实(fact)能否推导出价值(value)的经典哲学探讨参见大卫·休谟(Hume 1888)。在翻译伦理学领域, Baixel-Olmos(2021)对此做过简要思考。

部(即思维与身体)、外部(即环境)因素对其翻译伦理实践的塑造作用,旨在提出调节译者伦理表现的可行路径。在开展此类研究时,研究者应根据文献综述、翻译实践经验或观察等有意识地选择可能对译者翻译伦理实践施加重要影响的因素,将其合理概念化,而后通过描述性研究揭示其对译者翻译伦理决策与行动的影响。在选取译者个体相关因素层面,研究者在整合与利用翻译(伦理)学域内资源的同时,可积极借鉴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探究译者的道德敏感性、道德动机、道德韧性、性别、从业经验等因素对其翻译伦理实践的影响。例如,“道德压力(moral stress)”这一心理学概念指人在无法按照自身价值观念采取行动时所产生的罪疚感(Hubscher Davidson 2021)。该概念最先在护理学与社工研究中被广泛探讨。在翻译伦理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一概念展开研究,考察其对译者翻译(伦理)实践的影响(Kulishchuk 2023)。应用翻译伦理研究者可推进关于译者“道德压力”的认知研究,探究其在不同翻译场景中对译者伦理决策与行动过程的影响。在选取翻译环境相关因素层面,研究者应以翻译社会学(亦作“社会翻译学”)为参照,将翻译伦理实践视为一项扎根于特定社会、文化、历史现实的社会合作活动(Wolf & Fukari 2007),探究社会与物质环境因素,如翻译人员网络、翻译技术、文化规范、意识形态等,对译者伦理判断与行动的调节效应。譬如,在数字化翻译时代,各类翻译技术如何影响译者的翻译伦理实践?翻译学者们(如 Pym 2011; 任文 2020; Bowker 2021)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但远不足够。应用翻译伦理研究者可以紧贴前沿,从认知视角揭示翻译技术对译者情境化伦理实践的影响,推动新知识的生产。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以因果关系探究为目标的“翻译伦理实践影响因素研究”可采取质化、量化或混合方法。但不管研究方法如何,相关研究应始终坚持过程与情境导向(Saldanha & O' Brien 2014)。

此外,在研究问题需要、研究资源允许的前提下,研究者可通盘考察译者的情境化翻译伦理决策与行动以及译者个体因素与翻译环境因素对相关过程的影响,着力勾勒译者翻译伦理实践的认知全貌。

4. 翻译伦理认知研究的路径优势

综观之下,采取认知路径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主要具有下述几点优势:

首先,以译者伦理决策及行动为切入点进行翻译伦理研究是翻译伦理学的最新趋势(周猛 2022),因此,本文所提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的认知路径具有前沿性。聚焦于译者伦理决策与行动的翻译伦理研究尚处初级阶段,采用认知路径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可以引领当代翻译伦理学回答域内诸多重要关切。这些议题包括但不限于:译者职业道德规范如何在译者伦理决策层面发挥作用?基于相关认知研究的发现,可以对现存翻译道德规范做何种改进?不同的翻译技术(系统)如何制约或促进译者的翻译伦理决策与行动?可否基于相关发现完善翻译技术工具以及译者工作环境中内嵌技术系统的设计?翻译社区的组织架构、成员互动、组织文化等如何影响译者的伦理决策与行动?相关发现是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翻译社区的设计使其更有益于译者基于社区的翻译伦理实践?凡此种种问题,认知路径下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均可提供极具启发意义的答案。

其次,认知视野下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对聚焦于学生情境化伦理实践能力培养的当代翻译伦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相关研究可以为翻译伦理教学提供真实的翻译伦理案例,供师生进行分析探讨,以提升学生的翻译伦理感知与判断能力。完整的、典型性的职业译者伦理决策与行动案例还能直接为学生提供示范,帮助学生快速掌握特定翻译伦理情境下译者的伦理行动方法。另一方面,随着相关研究对职业译者翻译伦理决策与行动过程的描述与总结,翻译伦理教育者将有可能根据相关实证成果提出并持续完善具有“过程性、情境化(Process-Based, Situated)”特点的译者伦理决策与行动能力/专长模型,用于指导能力导向型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在翻译伦理的职业教育

之外,相关研究成果启发的教学法还可被迁移至志愿译者伦理培训、职业译者伦理继续教育等场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最后,认知视野下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具有天然的跨学科属性,可以从翻译学内、外部吸收丰富的实证研究资源,这是其具有强大学术生命力的根本保障。在翻译学内部,相关研究可充分利用认知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的研究积淀,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考察译者的翻译伦理实践过程。在翻译学外部,相关研究可广泛借用(或需适应性调整)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决策科学、信息科学、道德哲学等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不断丰富其理论视角、概念种类与方法手段。应指出的是,尽管采取认知路径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具有极强的跨学科性,其仍属于译学研究。相关研究下属于翻译伦理学,亦可视为认知翻译学的从属领域。理由有二:首先,既然翻译伦理实践是翻译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针对翻译伦理实践的认知研究也应是针对翻译实践的认知研究(亦即认知翻译学)的一部分。再者,当前认知翻译学的研究重点包括了译者的翻译决策过程与翻译行为,且相关研究日益趋向情境认知范式(Muñoz Martin & de León 2020)。因此,以情境认知为基础、聚焦译者在场化翻译伦理决策与行动的翻译伦理认知研究完全可以置于认知翻译学的研究框架之下——准确地说,翻译伦理的认知研究可视为认知翻译学的一个分支。若我们认可这一论断,则开展认知路径下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可同时推动翻译伦理学与认知翻译学的进步。

随着翻译伦理认知研究的不断开展,翻译伦理研究者、教育者与实践者或可发现相关研究在更多维度上的特色与优势,后续研究需适时地对此进行反思与总结。

5. 结语

鉴于国内应用翻译伦理研究发展滞后之现状,本文基于翻译伦理实践的情境认知本质提出了应用翻译伦理研究的数条认知路径,并对各路径下实证研究的开展方法进行了简要阐释。本文提出,认知路径下的翻译伦理研究可视为认知翻译学下的一个专门关注翻译伦理认知的分支。随着围绕翻译伦理认知过程研究的概念、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将持续助推翻译伦理学和认知翻译学的进步。同时,相关研究在国内的开展将能促进本土翻译伦理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均衡发展,提升本土翻译伦理研究成果在翻译行业与翻译教育实践中的应用潜力。

出于讨论聚焦的需要,本文所探讨的翻译伦理实践未纳入译者以外翻译活动主体(如翻译客户、委托人、读者、教育者、研究者等)的道德实践。事实上,这些多元主体的翻译相关伦理实践也属于广义范畴的翻译伦理实践,且越来越多地被关注与研究(周猛 2022)。因相关主体的伦理决策与行动亦是情境化的,本文所提的应用翻译伦理研究的几条认知路径应同样适用这些主体的翻译伦理实践的认知过程描述。后续研究可以探讨或通过实证研究验证这一迁移性论断。

参考文献:

- [1] Abdallah, K. Towards empowerment: Students' ethical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ng in production networks[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11, 5(1): 129-154.
- [2] Baixauli-Olmos, L. Ethics codes for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C]// Koskinen, K. & N. K. Pokor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Eth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 [3] Baker, M. & C. Maier. Ethics in interpreter & translator training: Critical perspectives[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11, 5(1): 1-14.
- [4] Baker, M.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5] Bowker, L.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nd ethics[C]// Koskinen, K. & N. K. Pokor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Eth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 [6] Dean, R. K.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Ethical Discourse and Moral Reasoning Patterns[D]. Edinburgh: Heriot-Watt University, 2015.
- [7] Elm, D. R. Cognitive moral development in ethical decision-making[C]// Wasileski, D. M. & J. Weber. *Business Ethics*. Bingley: Emerald Publishing, 2019.
- [8] Flach, J. Mind the gap: A skeptical view of macrocognition[C]// Schraagen, J. M., Militello, L., Ormerod, T. & R. Lipshitz. *Naturalistic Decision Making and Macrocognition*.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8.
- [9] Floros, G. Ethics in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education[C]// Koskinen, K. & N. K. Pokor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Eth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 [10] Greene, J. D.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oral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C]// Gazzaniga, M. S. & G. R. Mangu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4.
- [11] Haidt, J.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 108(4): 814–834.
- [12] Howes, L. M. Ethical dilemmas in community interpreting: Interpreters' experiences and guidance from the code of ethics[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23, 17(2): 264–281.
- [13] Hubscher-Davidson, S. Ethical str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C]// Koskinen, K. & N. K. Pokor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Eth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 [14] Hume, 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8.
- [15] Hutchins, E. Cognitive ecology[J]. *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2010, 2(4): 705–715.
- [16] Inghilleri, M. *Interpreting Justice: Ethics, Politics and Languag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17] Jones, T. M.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y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 An issue-contingent mode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2): 366–395.
- [18] Kalishchuk, D. Ethical stress in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J]. *East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s*, 2023, 10(1): 61–80.
- [19] Kohlberg, L.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as A Basis for Moral Education*[M]. Cambridge: Center for Moral Edu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1.
- [20] Koskinen, K. *Beyond Ambivalence: Postmodernity and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M]. Tampere: Tamper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1] Lambert, J. *Translation Ethic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 [22] MacDougall, A. E., Martin, A. A., Bagdasarov, Z. & M. D. Mumford. A review of theory progression in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literature[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4, 14(2): 9–19.
- [23] Muñoz Martin, R. & C. M. de León. Translation and cognitive science[C]// Alves, F. & A. Jakobse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 [24] Pym, A. What technology does to translating[J].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2011, 3(1): 1–9.
- [25] Pym, A. *On Translator Ethics: Principles for Mediation between Cultures*[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12.
- [26] Rest, J. R., Narvaez, D., Thoma, S. J. & M. J. Bebeau. DIT2: Devising and testing a revised instrument of moral judgment[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9, 91(4): 644–659.
- [27] Reynolds, S. J. A neurocognitive model of th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mplications for stud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6, 91(4): 737–748.
- [28] Risku, H.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as interaction research: From mental to socio-cognitive processes[J]. *MonTI. Monografías de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 2014, 331–353.
- [29] Risku, H. & F. Windhager. Extended translation: A sociocognitive research agenda[J]. *Target*, 2013, 25(1): 33–45.

- [30] Risku, H., Rogl, R. & J. Milosevic.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the field: Current research on socio-cognitive processes[J]. *Translation Spaces*, 2017, 6(1): 3–26.
- [31] Saldanha, G. & S. O'Brien.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32] Sannholm, R. & H. Risku. Situated minds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in translation: Exploring the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J]. *Target*, 2024, 36(2): 159–183.
- [33] Sonenshein, S. The role of construction, intuition, and justification in responding to ethical issues at work: The sensemaking-intuition mode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4): 1022–1040.
- [34] Tipton, R. *The Routledge Guide to Teaching Ethic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duc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 [35] Trevino, L. K.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organizations: A person-situation interactionist mode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6, 11(3): 601–617.
- [36] Tymoczko, M. *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37] Wolf, M. & Fukari, A.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7.
- [38] Zhou, M. Educating Translation Ethics: A neurocognitiv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approach[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22, 16(4): 391–408.
- [39] 冯曼. 译者、技术与世界: 翻译技术伦理反思[J]. 理论月刊, 2020, (5): 153–160.
- [40] 蓝红军. 关于翻译技术伦理性的思考[J]. 上海翻译, 2019, (4): 8–13+94.
- [41] 李其维. “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J]. 心理学报, 2008, 40(12): 1306–1327.
- [42] 李瑞林. 应用译学的学术前提与框架重构[J]. 中国外语, 2020, 17(6): 90–96.
- [43] 李征. 翻译伦理与中国典籍英译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3.
- [44] 刘云虹. 译者伦理: 身份、选择、责任——皮姆《论译者的伦理》解读[J]. 中国翻译, 2014, 35(5): 18–23+128.
- [45] 彭萍. 翻译伦理学[M]. 北京: 中央编译局, 2013.
- [46] 任文. 新时代语境下翻译伦理再思[J]. 山东外语教学, 2020, (3): 12–22.
- [47] 申连云. 全球化背景下翻译伦理模式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48] 谭业升. 认知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重新定位[J]. 中国外语, 2021, (3): 79–87.
- [49] 文旭, 肖开容. 认知翻译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50] 吴术驰. 翻译伦理研究的反思与重构刍议[J]. 中国翻译, 2021, 42(5): 5–14+191.
- [51] 辛广勤. “译者伦理”?——皮姆翻译伦理思想析辨[J]. 中国外语, 2018, 15(4): 96–103.
- [52] 辛广勤. 中西翻译伦理研究四十年(1984—2023)概略[J]. 翻译史论丛, 2024, (1): 97–111+176–177.
- [53] 杨洁, 曾利沙. 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的拓展[J]. 外国语, 2010, 33(5): 73–79.
- [54] 杨荣广.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 论题、问题与反思[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 28(6): 77–85.
- [55] 叶浩生. 认知心理学: 困境与转向[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0, 28(1): 42–47+90.
- [56] 张霄军, 邵璐. 构建可信赖机器翻译系统的基本原则——一种基于工程伦理的观点[J]. 外国语文(双月刊), 2021, 37(1): 1–8.
- [57] 张政, 王赞. ChatGPT 译文风格生成: 评析与思考[J].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4, (1): 10–15.
- [58] 周猛. 反思与突破: 新世纪西方翻译伦理研究的嬗变[J]. 中国翻译, 2022, 43(4): 133–139.

收稿日期: 2023 - 05 - 31

作者简介: 周 猛(1991—), 男, 博士, 讲师。研究方向: 翻译伦理理论研究、翻译伦理教学研究、翻译技术伦理研究。